

##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sup>〔\*〕</sup>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展示的人的发展观

○ 苗 苗<sup>1,2</sup>

- (1.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2.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广东 珠海 519041)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终极关怀和价值承诺,是激发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它寄托了人类的不懈追求与美好理想,是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和归宿。马克思在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解为人自身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的三种形态理论。即人的发展将经历以下三个历史形态:“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阶段”。但在现实社会图景中,当代人还没有摆脱片面发展的境遇。因此,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冷静审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清醒地认识人的全面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从生产力、社会关系(制度)等维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进行探索,努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寻找到一条现实道路。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片面发展;终极关怀;价值承诺;工具理性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体系之核心,探索并寻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终极价值目标。它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sup>〔1〕</sup>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

---

作者简介:苗苗,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讲师,珠海市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系广东省2013年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项目(编号:2013WYXM017)阶段性研究成果;广东省2012年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编号2012385)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sup>[2]</sup>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承诺描述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图景,是针对摆脱“人”和“物”的双重依赖关系而提出的。马克思同时还设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代替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形态。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建立起来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农业社会是巨大的进步,虽然具有许多局限,但我国目前还未达到其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然而,西方后现代批评的许多弊端却在我国出现。于是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我国还未达到发达社会的发展水平,未全面具备发达社会的优势;另一方面,却早早地具有了西方社会的弊端。这使我们的发展面临考验。我国人的全面发展既受农业社会的拖累,又受现代社会的局限;既缺乏发达社会的法制和自由,又沾染了发展社会的异化的毒素。只有坚持不懈的发展才能使我们走出困境。

### 一、当代人还没有摆脱片面发展的境遇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人的生存状态取决于人的生存条件。只要生产力还不发达,私有制依然存在,人们被动的服从社会分工,劳动还只能首先作为谋生的手段,只要社会还存在着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只要人们的联合还是自发的而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人们的生存状态就是异化的、片面的,而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相反,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彻底消灭了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彻底消灭了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人们才能摆脱异化的生存状态而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sup>[3]</sup>那么,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如何呢?

#### (一)传统价值观的失落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充分体现了对“人”和“物”的依赖关系双重摆脱的价值取向,对人的全面发展起到激励和推动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以人的独立、自由、平等来消解“人”的依赖关系,强化个人的主体意识,发掘个人的主体潜能;而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反对把人变成“物”的奴隶,力求避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人对“物”的严重依附关系。

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特别是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需要认清的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存在着对人的全面发展不利的负面效应。甚至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后果。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尺度,传统价值观中许多优秀的东西,如对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及一些良好的道德观念遭到冷遇甚至被抛弃,精神危机成为社会通病,从某种意义上又异化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面人”。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单纯的物欲的追求,一种“耻于理想,蔑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社会思潮和理论思潮,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深深的困惑与忧虑。<sup>[4]</sup>

## (二) 工具理性的扩张和僭越

在人类解放的视域下,教育之目的是通过“化育个体”和“改造社会”的功能造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体主体,这充分体现人性化和个性化是教育的特征。然而,现代技术在教育系统中的过度、盲目应用,造成了教育领域中的唯工具论、人与技术的关系异化等现象。从根本上讲是“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扩张和僭越的结果。

作为工具理性之集中体现的现代技术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手段或操作工具,其本身对人和都会会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由于人们过分依赖技术体系,反而会受到技术的“统治”和束缚,科技的异化不仅改变着人类的心灵结构,而且显示出某种不可驾驭的性质,限制和束缚着人类的行为和心灵。尤其是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过分注重和发展“技术理性”知识的传承功能,忽略教育的人文精神化育功能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人们不再关心终极意义和绝对真理,普遍丧失了批判与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境界和能力,因而根本无法与这个充满诱惑力的物欲世界相抗衡。<sup>[5]</sup>人的生存片面化,工具理性和功利原则被过分推崇,人在劳动中丧失了个性,能力片面甚至是畸形发展。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网络一方面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舞台,给人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又给人的发展带来新的问题:网络交往取消了人们直接交往的机会,拉大了人们之间的心灵距离,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隔膜;网络交往也造成了一些人人格上的分离或分裂,现实中的身份与网上扮演的角色可能出现较大的背离;网络社会中,电脑在变得越来越“人性化”的同时,却又隐含着“非人性化”的趋向,界面所带来的危险,有可能使人们与内心世界失去联系。<sup>[6]</sup>通过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将用户的社会关系迅速构建成其个人的社会关系生活圈(即微生活圈)。微信等语音信息功能满足了用户便利的沟通交流需求,因此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依赖。而微信开启的“微”社交网络时代,却同时伴随着犯罪率上升、犯罪手段多样化等社会问题。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于2013年10月23日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技战胜人类的噩梦》的文章,他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电脑、手机杀入了生活。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受资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的噩梦缓缓接近。而想象与诗意的衰退和丧失,自然而然会让人们失去对自身和社会解放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动力。

## (三) 大众文化泛滥的危机

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电影和广告等形态,具有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特征。<sup>[7]</sup>当然,审美文化应该雅俗共赏。对于大众文化的流行以及“泛娱乐”化的趋势,我们不能简单的抨击和批判,而是应该考虑到进步与落后、高雅与低俗等二元对立的政

治、道德批判立场,对大众文化问题作出冷静理性的学理分析。

然而,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全面批判,到葛兰西的中性立场,再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地支持,我们可以发现大众文化的合法地位正逐渐被社会所认同。<sup>[8]</sup>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被解构的困境。迎面而来的就是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对它的冲击。由于大众文化是一种媒介文化,一种平面化的文化的存在。大众媒介文化的存在,开放了教育的场所,它使权威的课堂教育延伸到了个体化的场所。它使严肃而权威的教育活动面临“平面化”,“娱乐化”,甚至是“低级化”和“庸俗化”的趋向和风险。对于人民群众个体而言,大众文化容易使个体沉醉于文化消费和文化享乐的状态,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我们要警惕大众文化的过度泛滥。文化制作程序化、运作商业化、形式快餐化、内容肤浅化,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缺失。文化的商品化和文化的世俗化日益消解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并常常打着“主流文化”的招牌或者与之合流,进行世俗文化扩充和当代文化的混杂,使当代社会在全面繁荣的假象下,诞生出内在的意义危机,并播撒着文化商品——那些能够使社会价值系统崩溃的文化细菌。

#### (四) 消费社会中日常精神生活的颓废

后现代大众传播和消费社会本是西方社会的现实写照,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播撒中逐渐延伸进当代中国大众生活。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消费主义思潮和电视媒体的世俗化倾向,已经和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个体空间和大众场域。<sup>[9]</sup>博德里亚文化理论提醒我们要重新认识知识生产,要深刻反思其立场、前提、利益冲突、文化产业资本的运作。企业和媒体煽起人们不合理的消费欲望,在引导人们追求奢华物质享受的同时,又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合理解决,将严重地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给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严重障碍。

除了受社会的客观因素制约以外,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和主观愿望,还受自身的主观因素的制约。其主要表现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与个人的思想观念变革相对滞后的矛盾;自由民主权利的扩大与个人享有这种权利的有限的矛盾;个人的主体意识、主体地位的增强与个人的自身素质有限的矛盾;自身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渴望与其实际行动缺乏的矛盾;还有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或者说对此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等等,这些自身的主观因素都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sup>[10]</sup>

##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

人类解放的理想并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而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所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共同追求。他们认为只要实现理性的启蒙,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求解实现人的解放。但恰如恩格斯所说,“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

讽刺画。”<sup>[11]</sup>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提出只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才能真正的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且,只有克服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深入考察,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有其特定的涵义和指向。在对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神圣的价值承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叙述其“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时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化,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sup>[12]</sup>从本质上讲,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的全面拓展,是人生自由与幸福的自我实现与不断超越,是人性真、善、美价值追求的获得与生成。

### (一)人对人的依赖的阶段

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刻地阐释了“人对人的依赖”这个低级的形态。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分工和交换很不发达,人无法独立地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只能依靠群体活动改造自然来满足发展自身的需要。个人没有独立性,人不能支配自己,人们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的地方性联系,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土地的附属物,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们只有相互依赖,才能进行物质生产。人的依赖关系也借助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了延续。交换也是一种实践,但这个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交换的范围十分的有限,“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连接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sup>[13]</sup>在这种原始的社会关系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只能建立在以自然联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之上,人的身份地位由血统决定,受制于权力意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血缘和权利本位的依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人的依赖关系”,“人的依赖关系”是三大形态最初的人的发展形态。在这一阶段压制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缺乏自我意识和权能,人处于无我的实践境界,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

### (二)人对物的依赖的阶段

“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sup>[14]</sup>其历史内涵主要包括“商品化”的需要、“能动—片面”的活动、“物化”的社会关系和“独立—物役”的个性等。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然共同体”

中,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缺乏独立自由活动的的能力与条件;大工业生产,不仅使人真正摆脱了完全受制于大自然的“自然依赖”,而且使人真正摆脱了完全受制于社会限制的“人身依附”,从而为发展人的独立个性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就人的活动而言,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力也随之不断增强,人作为自主性的实践存在独立于自然界,赢得了在自然界中独立的地位和自主的尊严;另一方面以分工为前提、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使得人的劳动及其产品在质上存在着差别,这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同质性,造成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独立化、职能的专业化、能力的差别化,使人的活动、能力、需要等具有了异质性,从而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等价交换,这就自然引发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独立和平等的追求,这就使得人从天然的靠血缘维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有了个性独立和按个人自由意志行事的可能性。但这种独立是表面上的独立,是“以物为基础的独立性”。离开了对货币(物)的依赖,这种“独立性”则无从谈起。对“货币(物)”的依赖,是“物化”社会关系的本质,而“物役”的个性则是“物化”社会关系的必然的逻辑推衍。总之,“以物为基础的独立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发展受到了新的限制,缺乏真正的个性独立。如果有个性的话,也是依赖于物,为物所役使的“物役”个性。

### (三)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阶段

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丰富与完备,人们才能摆脱来自“人”和“物”的双重羁绊与依附,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终于成为社会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由的人。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异化现象的分析阐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强调,未来新社会是“在保证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sup>[15]</sup>此时,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其中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生产力的提高导致人的私欲的衰减或者消除。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sup>[16]</sup>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使得个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则应该消除人对私物的占有欲。想要做到这一点,应该依靠生产力的提高而得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个体对于社会发展、生命存在的意义认识,从而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人得到全面发展。

第二,交往在人的自由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交往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sup>[17]</sup>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逻辑中,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交往发展的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交往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sup>[18]</sup>当然,交往还包括两性交往,即人口繁殖等。这些交往都是媒介交往。

两位伟大导师不仅研究了交往的历史与形态、交往的价值与意义,也提出了“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导引的或媒介的人的发展向度:最原始最古老的交往形态、交往形式和最现代最发达的交往形态、交往形式。前者是“过去”的向度,后者是“未来”的向度,这两个向度至今存在于当代开放的社会之中。但是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而把握“未来”需要直面“过去”,从而在“过去”和“未来”之中聚焦“现在”人的全面发展。随着媒介交往方式的跃迁,如网络的出现,使人之间的交往自由地跨越民族、国家的界线,按照自己所需和意愿平等地从事交往活动,自由地与任何主体交往,在此过程中人的能力素质不断得以提高,人的社会关系不断拓展,人的巨大创造性和深层全面发展将不断呈现出来,这一切导致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通过以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和终极关怀,尊重个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性,尊重自由,尊重创造,尊重需要,并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使个人的全面发展能满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给个人的全面发展打开一扇面向更高发展阶段的窗口,敞开通向“自由王国”生存方式的理想空间。

### 三、人的全面发展要不断认识和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终极理想”,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 (一)理想状态中的全面发展与现实状态中的片面发展之间的矛盾

俞吾金教授指出:“马克思说的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中国学者提出的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都是理想状态中的目标。”<sup>[19]</sup>理想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人本身就是一种生存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存在物。他处在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既是当下的存在,又不断走向未来;既服从现实,又不屈从现实,并通过自己的能动活动超越当下现实。<sup>[20]</sup>如果人完全满足现状,就会不思进取,遗忘未来,失去崇高。只有充满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人才能不断地拼搏、进取,才有精神支柱和前进的动力。人也不能始终生活于空幻的理想之中,如果人仅仅抱着理想追求,那么就会使人游离现实,陷入梦境之中。人们应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从对立中去求取和谐,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地从今天走向明天,从现实走向未来。

人类社会总是表现出不平衡的运动进程,而每一个现存的社会又表现为静止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只是暂时的、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切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

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sup>[21]</sup>

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平衡只是相对于整个社会进程的某一个阶段来说的，现实社会总是于不平衡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暂时的平衡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然存在着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冲突。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即如何使理想最终成为现实，也就是理想的最终结果与现实的合力方向一致性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既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确立而宣告结束，也不会因为苏联解体而宣告“历史的终结”，作为自然的历史过程必将沿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毅然走向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境界。

##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人的全面发展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我们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推向理想的“乌托邦”，但也不能盲目认为未来社会理想在今天就可以马上变为现实。

展望未来，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它是人们理想期待而当前还不能全部实现的价值目标。在一定社会，人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全面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的素质能力的全面性又会提出新的要求。它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生成不断超越的过程。但它的根据从不会脱离现实。因此，根据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换言之，社会主义不只是简单地提供一个消费模式，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现实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sup>[22]</sup>未来更高社会理想的实现，更不是一两个人一两天的事情。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需要我们在现实中不断迎接挑战、努力开拓、探索出人类解放的具体实现方式。它就要靠千百万群众的坚持不懈的长期奋斗。正如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sup>[23]</sup>这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思想准备。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的全面发展从来都是并将永远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一种“应然”，它会不断地向“实然”转化，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变成“实然”，永远不会失去其超越现实、高于现实的理想性质。<sup>[24]</sup>

基于人的片面发展的现实境遇，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关怀，与现实生活还存在一定的间距和张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相对于人的片面发展而言的，如果说旧式分工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现实宿命即不可避免地沦为“片面的人”的话，那么，能够在一切领域获得发展的“全面的人”的出现就意味着且必然



要求旧式分工的彻底消灭。<sup>[25]</sup>在马克思之前,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曾经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然而他们往往都是把人抽象化,找不到从理想通往实际生活的现实道路。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奠基于人的活动规律,即实践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之上,主要从生产力、社会关系(制度)等维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进行探索,努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寻找到一条现实道路。

### 注释: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 [2][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607页。
- [3]王金福:《对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再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 [4]孙正聿:《寻找“意义”:哲学的生活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 [5]刘同舫:《人类解放视域中的教育价值合理性探析》,《教育研究》2010年第8期。
- [6]丰子义:《全球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 [7]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 [8]章剑锋:《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思政教育与公民意识的塑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
- [9]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 [10]陈金明:《理想与现实: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承诺和当代形态》,《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 [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67页。
-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5页。
-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
- [19]俞吾金:《“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之我见》,《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8期。
- [20]刘世明:《立足现实 瞩目未来——谈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
- [22]谭培文:《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与现实的二难解读》,《学术研究》2003年第3期。
- [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 [24]汪信砚:《社会理想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 [25]王虎学:《论“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责任编辑:钟 和]